

# 清代舟山的移民潮

□李世庭

## 明清三次徙民

清代的移民潮源自明清两代的三次徙民。

首次徙民在明洪武十九年(1386),征南将军汤和经略海上,途经舟山境域时,麾下二名军官被兰秀山人杀害。汤和以为边海不宁,危及京都(南京),奏请朝廷徙民废县、实行海禁,徙昌国46岛居民34万余人到浙东、浙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县。紫微人王国祚面奏明太祖,请求免徙,准留舟山岛居民547户、8805人。过不久,海禁渐弛,所徙岛民陆续潜回。

清顺治六年(1649)十月,南明鲁王朱以海退守舟山,此时城内人口增至2万余。顺治八年九月,清军攻占昌国城,军民死1.8万余人,清军迁调四乡居民1150户入城居住。顺治十三年(1656)年底,清将伊尔德以“舟山不可守”为由,再次徙岛民入内地。

顺治十五年(1658),明将郑成功率水师20万人进驻舟山,被徙的岛民以为复明有望,又纷纷潜回。不料一年不到,郑成功撤军回厦门,舟山又被清军占领,再次下令徙民。

顺治十六年(1659),朝廷下令驱徙岛民1118户、5220人,经过这三次徙民,舟山成了荆棘丛生、野兽出没的荒岛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十月,朝廷颁《展海令》,康熙二十七年(1688)置定海县,原定海县改称镇海县。舟山各岛陆续展复,官方开始召民回垦,老舟山人回来重建家园。经过20多年颠沛流离,能回来的舟山人已不多了。有钱的大户人家投亲靠友,在内地定居下来;有手艺或有一定专长的人,在内地找到了职业,便留了下来。极大多数人无依无靠无法谋生,鳏寡孤独、老人小孩,经不住寒来暑往的煎熬,在贫病交迫中死于他乡。据康熙五十二年(1713)统计,回来的舟山人仅有7253人,其中舟山岛5220人,金塘岛1283人,安期乡(含岱山、长涂、秀山等)66人。

新设的定海县人口不足万人,召民回垦当时成了头等大事。

## 破解难题

召民回垦,谈何容易,有人想上岛来,一看岛上荒芜不堪,便知难而退。定海县首任知县叫李侗,他看到舟山岛上荒凉景象便生退意,他跟舟山总兵黄大来又合不来,多有抵牾,上任不到一年便打了退堂鼓,告老还乡去了。

接替他的是进士出身的周圣化。这位周知县很负责任,也很能干,他很快把县署、县学、仓廩等重要设施恢复起来,朝廷拨款给定海县建城墙,他担任承造官,日夜操劳筹划修筑城墙事宜。他还想修编一本康熙《定海县志》留传后世。

这样一位勤劳能干的知县,在召民回垦这件事上却一筹莫展,也感到为难。他在《定海县志》的序言中诉苦说:“圣化之为多方招来,委曲区处,荆棘灌丛之乡,豺貉纵横之窟,历崎岖,冒风露,而身先焉……每钱日戴星,仓猝诸郡,出没风涛,托命蛟鲸,呜呼!圣化于此,不独无居官之乐也,盖备尝人生未有之苦焉。”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周圣化升任陕西秦州知州,离开定海。次年,江阴人缪燧来定海任知县,召民回垦这一难题开始有了转机。

缪燧贡生出身,没有“官架子”,很亲民,他到定海时,海岛的荒芜景象尚未改观,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:“其兵燹之后,废弃又数十年,故里丘墟,田庐茂草,极目祇崇山剑立,大

海狂涛而已。”缪燧礼贤下士,跟许多热心于重兴舟山的士人,如紫微的黄灏、舵舂的史节文、城北的孙龛业、芦花的吴运等人打成一片。为了改变舟山面貌,他不耻下问,听取大家意见。黄灏等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兴修水利,改良土壤:“徙民以来,塘碛久废,河与海相通,朝潮夕汐,靡日不浸,田畴禾黍不登,民无所赖”。岛上土地因河海相通,盐碱化严重,种不了五谷杂粮,人们上岛来无以为生,所以不愿移民过来。

大家的意见让缪燧明白,筑塘修碛,捍卤蓄淡,是破解召民回垦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。于是他亲自带头,号召群众,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修塘筑碛的高潮。他身体力行,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,被群众誉为“筑塘老爷”,把他小沙筑的一条塘称为“缪公塘”。缪燧任定海知县22年,修筑海塘23条,长13173丈,垦田万余亩。在他带动下,舟山各岛都修塘筑碛,到宣统二年(1910),定海境内共建塘堤135条,总长36500丈,将大片盐碱化土地改造成良田沃壤。舟山岛有地可耕,有山可樵,有海可渔,成为谋生的好去处。于是人们一传十,十传百,移民纷至沓来,舟山成了移民的热地。

如上所述,康熙五十二年时,舟山人口7253人,到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据1994年编的《定海县志》载,舟山人口达344890人,增长47倍。据1987年统计,定海县(包括普陀、岱山)全县居民有姓氏352个,其中59个是世居舟山的老舟山人,人口有104002人,占总人口的32.92%;还有293个姓,232331人是移民,占总人口的67%,一些边缘小岛,移民的比例还要高一些。移民主要来自宁波地区的镇海、鄞县、慈溪、奉化、象山、余姚,以及省内其他地区和福建等省。移民人数超过舟山原住民两倍还多,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。

## 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

移民的到来,改变了舟山原有的社会结构,为舟山的渔业、工商业、服务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、有力地推动舟山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不同的地域文化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,在这里交织、碰撞、磨合,促使舟山文化的多元化,丰富了舟山的海洋文化。随宁波人带来舟山神信仰,随福建人带来妈祖信仰,逐渐被舟山人接受,定海城东建起了宅山庙,道头建起了天后宫。“八月十六过中秋”原是宁波人的习俗,也被舟山人所接受。

给舟山民间习俗带来较大影响的是移民中一批曾经称为“墮民”的人。墮民原是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所谓贱民。只能从事打铁、理发、杀猪、抬轿子吹喇叭等各种“贱业”,虽然光绪年间,这项规定已经废除,但墮民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职业一时难以改变。解放前,民间办红白喜事,墮民是少不来的。办喜事,要请墮民来吹吹打打,制造欢庆气氛,结婚成亲,要请墮民家妇女(俗称“墮民嫂”“送娘”)来为新娘子梳妆打扮,陪新娘子举行婚礼;办丧事,要请墮民来抬棺哭丧,举办各种婚丧喜事都离不开墮民。这种情况在解放前十分盛行,解放后移风易俗,方才绝迹,墮民大多转营其他职业。

墮民都是吹拉弹唱的好手,其中有不少能人。舟山的木偶戏原有两种,除布袋木偶之外,还有一种杖头木偶(俗称“下弄上”),即为民国《定海县志》“风俗”中说的“围幕作场,大敲锣鼓,由人在下挑拨机关,则傀儡自舞动矣,其唱白亦皆在下之人为之”。可惜的是“下弄上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随着墮民的消失,没有传

承下来。

## 开创舟山渔业新局面

1989年出版的《舟山渔志》说,早在乾隆四十八年(1783),舟山渔业还处于近洋生产阶段。随着移民到来,象山东门的大捕渔民、鄞县东钱湖地区的大对渔民跟着到舟山渔场生产,舟山渔民学习大捕、大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,使舟山渔业由近洋生产逐步向远洋作业发展,开创了舟山渔业的新局面。据1935年10月《浙江建设月刊》《舟山群岛的渔业》载:“1934年,全县出海的大对船有500对、大捕船有240艘,网捕乌贼船420艘、流网船460艘。”抗战前,全县渔业年产量在6万吨左右。

舟山的一些小渔村大多是移民催生出来的,道光年间,除大捕、大对渔民,还有很多鄞县、奉化、象山和福建的渔民到舟山渔场生产。福建的小钓船在中街山列岛钓墨鱼,瑞安、鄞县的渔民到中街山拖捕墨鱼,为了便于生产,他们逐步在青浜、庙子湖、黄兴、东福山岛上定居下来,形成渔村。蚂蚁岛开始只有一户姓陆的居民从事张网生产,随着移民到来,居民增加到30多户,成为小渔村。虾峙的栅棚原先只有姓顾和姓王的2户居民在海边张“高桩”,后来发展到300多户,小对船、小流网作业也相继出现,渔村更加兴旺起来。

沈家门原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,北宋徐兢在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中说:沈家门“四山环拥,对开两门……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。光绪年间,沿北岸垒石筑塘。才有来自定海、鄞县和福建的渔船到此停靠。随着渔民到来,岸上才有集市。到上世纪30年代,沈家门渐成闹市。

## 清末民初的经商潮

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在舟山岛上碰撞交融,极大地丰富了舟山的海洋文化,给舟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在“宁波帮”传统的商业文化影响下,舟山人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,“面向海洋,敢闯四方”改革求变的创新精神,冲破了重农抑商的大潮。民国《定海县志》说:“地狭人稠,生活维艰,而冒险之性又岛民所特具,饥驱寒袭,迫而至外,航海梯山视若户庭,光宣以来,商于外者尤众,逐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。”

民国十七年(1928)统计,舟山外出谋生的有14825人。经多年拼搏,涌现出一大批事业有成的定海商人,有的甚至声名显赫,如朱葆三、刘鸿生、董浩云、安子介、王启宇、周祥生等。

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,是舟山最为繁荣和兴旺的时期。定海城里以状元桥为中心,周围有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5条大街,为闹市区。5条大街商铺林立,百业兴旺。同时,外埠来定海通商、通航的船只增多,促使道头一带商业区的形成,该区以保定路、泰山路、福定路为主脉,北延至半路亭,南迄泥城外沿海码头,西自拷淘弄,东到石灰道头,沿途商铺密集,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区。

本版与市政协  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 
第1208期

来稿请发  
zswb03@zsnews.com